

商人起航的港口就是尸拉夫港〔1〕。文献还述及运往中国的中东货物从巴士拉先运至尸拉夫，再取道印度西南马拉巴尔海岸最重要的港口马斯喀特和奎隆前往中国，且尸拉夫也是中国货船到达波斯湾停靠的港口〔2〕。商人扎伊德(Abū Zaid)提到数量众多的陶器、中国瓷器残片散布各处，中国的硬币甚至在尸拉夫流通〔3〕。马夫班遗址发现的包括白瓷在内的中国陶瓷，应当就是当时从尸拉夫装船运往巴士拉、巴格达和萨马拉方向时沿途停靠时的遗留。

萨马拉遗址发现后，英国学者霍布逊(R. L. Hobson)提出，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中国陶瓷是经由中亚由陆路输入的。但这一观点随即为伯希和(Paul Pelliot)所否定，他指出中国陶瓷这种易破碎的商品是依靠海上贸易输入波斯湾诸港口的。当时阿拉伯的航海商人留下了西方文献中最早关于中国瓷器的记述。地处土壤肥沃的伊朗高原中部的内沙布尔，有完备的灌溉系统，农业发达。萨珊王朝时期已建立起城市，九世纪以后随着呼罗珊省事实上的自治，内沙布尔作为区域中心城市的重要性愈加凸显。虽然发掘区域有限、出土中国陶瓷数量很少，这样的产品结构 with 尸拉夫遗址为代表的印度洋港口城市基本一致，暗示其是由波斯湾港口地区输入的〔4〕。这一结论也为考古学证据所不断证实。同时，发现于非洲地区的中国陶瓷也是经由尸拉夫中转的。九世纪时，白瓷的流通范围止于以尸拉夫港为中心，波斯、阿拉伯人控制核心区域的波斯湾和阿拉伯半岛区域，东非地区中国白瓷的出现要晚至十世纪以后。

(五)输出白瓷的奢侈品属性

唐五代白瓷在海外的发现，其奢侈品属性体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高等级的消费群体与消费地。朝鲜半岛和日本两地出土的唐五代白瓷情况具有相似的性质：白瓷的主要消费群体为具有很强势力的僧侣和上层贵族。朝鲜半岛发现有白瓷的主要是寺院遗址，且多集中在新罗、高丽的都城及其周围。由此来看，朝鲜半岛此时包括白瓷在内的中国陶瓷的消费者主要是宫廷、贵族和寺院僧人群体〔5〕。日本出土白瓷的遗址点最密集、数量最多的区域在平安京城内，显示了作为都城和王公贵族聚集区较高的消费能力。其他区域出土中国白瓷(也包括其他中国陶瓷)的数量都较少，且遗址分布较为零散，性质也多为寺院、衙署或贵族府邸等，说明此时包括白瓷在内的中国陶瓷在所谓的“初期贸易陶瓷”阶段，还具有奢侈商品的性质〔6〕。白瓷的出土数量和所在遗址数量远低于以越窑青瓷为代表的南方青瓷

〔1〕 Wilson, Arnold, *The Persian Gulf: An Historical Sketch from the Earliest Times to the Beginning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Routledge, 2011, 58.

〔2〕 Whitehouse, David, *Excavations at Sirāf; First Interim Report, Iran 1968*, 6:1-22.

〔3〕 Wilson, Arnold, *The Persian Gulf: An Historical Sketch from the Earliest Times to the Beginning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Routledge, 2011, 92-95.

〔4〕 Pelliot, Paul, *Bibliographie: The George Eumorfopoulos Collection. Catalogue of the Chinese, Korean and Persian Pottery and Porcelain, T'oung Pao 1927*, XXV:101-175.

〔5〕 申浚：《韩国出土唐三彩》，北京艺术博物馆《中国巩义窑》，中国华侨出版社，2011年。

〔6〕 裴岚：《7-14世纪中日文化交流的考古学研究》，229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

产品的现象,当是与不同窑场在通往陶瓷输出港口时交通是否便利直接相关,同时可能白瓷相对较高的运输成本也增加了其本身的价值,这也是白瓷在日本出土数量不及越窑的原因之一。

根据尸拉夫的发现,可知中国陶瓷到达以波斯湾为代表的印度洋地区,最早为长沙窑、广东青瓷和疑似巩义窑的白瓷产品,出现时间在九世纪初,而越窑青瓷、邢窑白瓷稍晚,从九世纪中期开始输入。毕梅雪(Michèle Pirazzoli-t'Sersterens)在考察波斯湾地区九至十四世纪出土中国陶瓷器时认为,中国陶瓷器多作为奢侈饮食器皿被富贵阶层所使用〔1〕。白瓷产品表现得尤为明显。尸拉夫的发掘中,除了进出船只、装卸货物的港口附近发现白瓷以外,可以确定白瓷作为使用器物的,仅发现于两处大型居住址内,发掘者推断为豪华住宅区〔2〕,而在城内大型清真寺的发掘中仅见有长沙窑瓷器和广东青瓷〔3〕。白瓷最重要的消费地则是当时阿巴斯王朝的首都巴格达和萨马拉。巴格达出土的中国陶瓷情况不甚明了,但根据阿拉伯史料的记载,这里作为都城有大量各地转运而来的货物,巴士拉学者扎西兹(al-Jā hī z)《商务的观察之书》中记载世界各地运往巴格达的货品中就包括中国瓷器〔4〕。萨马拉王宫中出土的白瓷也说明这些产品是作为奢侈品为贵族甚至皇室消费和使用的。北非福斯塔特在九世纪后半期逐渐兴起成为区域性中心时开始有白瓷产品输入,此时相当于尸拉夫港发展序列的第二个阶段,这一遗址也是当时这一区域异常繁荣的都城所在。而这些外来物品在当时的东非地区均属于奢侈商品〔5〕。此时这里虽已经是印度洋贸易圈中的一环,长沙窑、广东青瓷等产品也在九世纪后半叶进入拉穆群岛区域,但白瓷的出现可能要到十世纪中期或更晚,即南方白瓷开始大规模输出以后,这似乎也暗示了以尸拉夫港商人为代表的商人群体在用商品换取这一区域的木材、铁等原材料时并没有选择相比其他瓷器品种更为珍贵的白瓷。

第二,中国白瓷仿制品的出现。这是唐五代白瓷在印度洋区域奢侈品属性的另一表征。九世纪初,在阿巴斯王朝的东部,伊斯兰釉陶器的制造传统和施釉、装饰等工艺发生了“革命性”变化,如出现了受唐代陶瓷影响的小碗;采用不透明釉;釉下施钴蓝、绿彩、褐彩和釉上施拉斯特彩(lustre)等新现象。同时铅釉陶器也发生改变,开始采用模制成型,多彩陶开始出现黄色和

〔1〕 Pirazzoli-t'Sersterens, Michèle, Une Denrée Recherchée: La Céramique Chinoise Importée dans le Golfe Arabo-Persique, IXe – XIVe siècles, *Mirabilia Asiatica. Productos Raros No Comércio Marítimo/Produits Rares dans le Commerce Maritime/Seltene Waren in Seehandel*, Vol. 2, ed. Jorge Manuel dos Santos Alves, Claude Guillot, Roderich Ptak, Harrassowitz, 2005, 2:69–88.

〔2〕 Whitehouse, David, Excavations at Siráf; Fifth Interim Report, *Iran* 1972, 10:63–87; Excavations at Siráf; Sixth Interim Report, *Iran* 1974, 12:1–30.

〔3〕 Whitehouse, David, Excavations at Siráf; Fourth Interim Report, *Iran* 1971, 9:1–17.

〔4〕 张广达:《海舶来天方 丝路通大食——中国与阿拉伯世界的历史联系的回顾》,周一良《中外文化交流史》,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

〔5〕 Zhao, Bing, Luxury and Power: The Fascination with Chinese Ceramics in Medieval Swahili Material Culture, *Orientalism* 2013, 44(3):71–78.

以锰为呈色剂的紫色〔1〕。及至九世纪末,这些新兴的釉陶产品开始在伊斯兰地区广泛分布,尤其集中于以萨马拉为中心的今伊拉克地区〔2〕。怀特豪斯提出了“萨马拉革新”(Samarra horizon)的概念,来指代伊斯兰釉陶发展中这一新的变化,影响很大〔3〕。扎勒根据萨马拉遗址的发掘资料认为九世纪时伊斯兰釉陶的生产受到了输入中国瓷器的影响〔4〕。而沃森(Oliver Watson)根据对萨珊时代后期埃及、叙利亚陶器生产传统的观察,认为单纯地说受到中国输入瓷器的影响并不正确,伊斯兰釉陶生产上的变化是大量叙利亚移民进入阿巴斯王朝后带入的陶器生产传统和高档陶器的消费观念的影响所致。但不可否认的是,中国输入瓷器迎合了这种新兴高档陶瓷器消费的口味,尤其是模仿白瓷唇口碗的“萨马拉碗”(有的还在白釉陶器上施蓝色或绿色的拉斯特彩)成为当时最流行的高档产品〔5〕。达什凯维奇(Małgorzata Daszkiewicz)等对出土于萨马拉的这种仿唐白釉陶器进行科技检测,结果显示其为锡乳化的铅釉陶器〔6〕,这种制陶技术即为沃森所言叙利亚的传统〔7〕。根据这种釉的特性许多研究文章又称其为“不透明釉陶器”(opaque glazed wares)。这种类型的陶器于九至十世纪从伊拉克出口到南非至泰国的整个印度洋区域,但却没有再跨越马来半岛〔8〕。上述泰国马来半岛的两处遗址即发现了这类产品〔9〕,标记出这类产品的市场在印度洋东部的边界。以上现象可作如下解释,随着叙利亚地区追求精致陶器消费风气传入阿巴斯王朝,西亚地区对中国白瓷产品的追求因价格过于高昂而只能为少数阶层所使用,故而在已有陶器生产技术传统的支撑下生产出仿中国白瓷(主要是唇口碗类)的锡白釉产品,并在九至十世纪成为行销整个印度洋区域的一类商品。虽然东亚、西亚两个区域的陶瓷生产技术之间是否存在直接影响的问题过于复杂,不能只通过简单的器形、装饰比较就做出推论,但上述现象从一个侧面体现了这一时期中国白

〔1〕 Northedge, Alastair, The Samarra Horizon, in *Cobalt and Lustre: The First Centuries of Islamic Pottery*, ed. Ernst J. Grub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21—35.

〔2〕 Northedge, Alastair, The Samarra Horizon, in *Cobalt and Lustre: The First Centuries of Islamic Pottery*, ed. Ernst J. Grub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21—35.

〔3〕 Whitehouse, David, Islamic Glazed Pottery in Iraq and the Persian Gulf: the Ninth and Tenth Centuries, *Annali-Instituto Orientale di Napoli* 1979, 29:45—61.

〔4〕 Sarre, Friedrich Paul Theodor, *Die Ausgrabungen von Samarra. Band II: Die Keramik von Samarra*, Dietrich Reimer, 1925, 37.

〔5〕 Watson, Oliver, Revisiting Samarra: The Rise of Islamic Glazed Pottery, *Beiträge zur Islamischen Kunst und Archäologie* 2014, 4:123—142.

〔6〕 玛乌戈热塔·达什凯维奇、格沃尔夫·施奈德、埃娃·博布雷克:《1911—1913年萨马拉出土的中国白瓷科技考古》,上海博物馆《中国古代白瓷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海书画出版社,2005年。

〔7〕 Watson, Oliver, Revisiting Samarra: The Rise of Islamic Glazed Pottery, *Beiträge zur Islamischen Kunst und Archäologie* 2014, 4:123—142.

〔8〕 Priestman, S., Opaque Glazed Wares: The Definition, Dating and Distribution of A Key Iraqi Ceramic Export in the Abbasid Period, *Iran* 2011, 49:89—113.

〔9〕 何翠媚、班臣:《泰国发现的9世纪中国北方白瓷》,上海博物馆《中国古代白瓷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海书画出版社,2005年。

瓷产品在印度洋作为一类求之不易得的奢侈商品属性,以及这一属性所延伸出来的中国陶瓷对西亚地区陶器生产在非技术层面的影响。

综上所述,唐五代白瓷在东亚、东南亚和印度洋贸易圈的流通和消费虽然存在着一定的差别,但无论在哪个区域,白瓷产品均属于贵重的奢侈品。其原因与此时中国陶瓷输出的性质有直接关系,即此时在陶瓷贸易中的主导因素是云集于各个陶瓷输出港的不同种族与身份的商人群体,他们选择在港口市场上可以见到的各种货物,运销海外以获取利润。尽可能地规避风险是商品交换的一个基本准则,因此,低成本、高收益的产品自然成为首选。以扬州为例,因为交通便利、运输成本较低的南方诸多窑场的产品(如长沙窑),其市场价值可能本来就低于运输成本高昂的北方白瓷产品,这自然成为商人们获取高额利润又避免远洋贸易中不可预计损失的最优选择。紧靠广州的广东诸窑场的产品较早、较多地运销海外,也是同样原因,甚至因为其低廉的价格充当了海上陶瓷贸易中的包装用瓷。而白瓷在早期中国陶瓷输出产品中比例始终不高的原因就是因其成本更高、运销风险更大。西亚地区中国白瓷仿品的出现和流行,正与此密切相关。这种状况到十世纪中叶以后,随着南方白瓷开始占据输出白瓷产品的主流而逐渐发生改变。北宋以后,大量南方白瓷在海外发现,日本贸易陶瓷在十一世纪以后博多贸易时期进入了所谓“白瓷时代”〔1〕。虽然输出品类依然是白瓷产品,性质却完全改变,即一批占据地缘优势的窑场开始依靠海路交通条件的便利大量输出产品,而并非只依靠港口城市本身的产品结构形成外销组合。

四 结 语

通过对海外港口、沉船及其他类型遗址考古调查和发掘出土(出水)唐五代白瓷的分析,可以勾勒出这一时期中国白瓷的分布地域与流通范围,进而对白瓷输出的形式、数量、产品来源、起点、中转与终端以及唐五代输出陶瓷中白瓷的属性和地位等问题展开讨论。

唐五代白瓷有贸易输出与非贸易输出两种形式。七至八世纪时,通过朝贡-赏赐体系以及遣唐使、留学生和求法僧人等群体私自购买携归,白瓷开始以非贸易输出的形式少量出现于日本和朝鲜半岛。九世纪以后,随着海上交通的逐渐成熟、扬州等港口城市的兴盛,白瓷与越窑青瓷、广东青瓷、长沙窑瓷器等其他陶瓷产品共同构成中国早期贸易输出陶瓷组合,开始出现在东亚、东南亚和印度洋沿岸地区。不过,这一时期白瓷在海外出土的遗址数量和产品数量均相对较少,在数量上始终不占优势。就白瓷本身的来源来看,大体上七至八世纪的非贸易输出白瓷均为巩义窑产品,九世纪时输出白瓷以邢窑和巩义窑的产品为主,定窑白瓷的外销则开始于十世纪前后。至十世纪中期以后,即五代末期至北宋前期,随着南方白瓷在外销产品中的大量

〔1〕 亀井明德:《初期輸入陶磁の受容構造の特質》,九州歴史資料館《大宰府古文化論叢》,吉川弘文館,1983年。

出现,中国陶瓷的输出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在中国,扬州、明州曾先后作为白瓷输出最重要的启运港。从东南亚、南亚出土白瓷的情况看,只有少量白瓷在港口停靠过程中通过小额贸易中转流入停靠港进而进入内陆的城市、寺庙等地,其他有中国白瓷出土的遗址多为白瓷流通过程中的中转港口。当时中国白瓷最主要的消费地是以尸拉夫、内沙布尔、萨马拉等为核心的西亚地区,并在较晚的时期进入埃及和东非地区。

以往的研究,学者多认为唐五代白瓷虽然已经进入了外销陶瓷之列,其重要性却不及同时期发现产品数量较多的越窑青瓷、长沙窑瓷器。但通过具体的分析可以发现,这一时期陶瓷输出并未直接与窑场发生联系,在主要依赖港口市场的背景下,白瓷在输出陶瓷组合中之所以相对稀少,是由于输出条件及港口市场的产品构成本身所限,并不能说明其在早期外销陶瓷组合中的地位不及其他类型的产品。中国陶瓷以奢侈品的属性出现在从东亚到东非的广大地区,其中白瓷在中国陶瓷输出的最初阶段更为明显地显示出奢侈品的属性。在东亚,使用的阶层主要是势力强大的僧侣和贵族;在印度洋地区,也主要为宫廷、富豪所专有。随着白瓷的输入,中国文化对东亚、西亚等地区也产生了一定影响。在东亚地区,寺院开始使用输入白瓷,其所代表的饮茶风气也输入日本和朝鲜半岛,并影响上流社会的生活方式。而在求之不易得的情况下,西亚地区甚至出现了中国白瓷的仿制品,并成为当地的特色输出产品且行销整个印度洋沿岸地区。从这个角度来说,这种来自东方的宝物也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西亚、中东地区的陶瓷生产面貌。通过白瓷的个案研究,可以更深入地理解早期中国陶瓷输出状况。

附记: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定窑考古资料整理与综合研究”(项目编号:22&ZD245)的阶段性成果。特别感谢高美京女士对海外出土定窑白瓷研究心得的无私分享!写作过程中还得到张荣蓉、沈颢、徐文鹏、范佳楠、钟允夕、赵晖、何馨雯几位学仁的无私帮助,谨此致谢!

A RESEARCH ON CHINESE EXPORTED WHITE WARES AND RELATED ISSUES IN THE TANG AND FIVE DYNASTIES

by

Li Xin

Through the research of Chinese white wares discovered from surveys and excavations of overseas sites, cities, ports, and shipwrecks in the Tang (618—907 CE) and Five dynasties (907—960 CE), the exportation, circulation, and consumption of white wares within this period can be revealed. In the seventh and eighth centuries, white wares were brought to Japan and the Korean Peninsula in East Asia as gifts from Chinese courts among other non-trade channels. After the ninth century, port cities like Yangzhou flourished along with the expansion of maritime traffic. White wares as part of the Chinese exported ceramic assemblage started to appear in East Asia, Southeast Asia, and the Indian Ocean. White wares from Xing and Gongyi kilns were exported in the 9th century, while those from Ding kilns were exported around the 10th century. In the quantity of exported Chinese ceramics, white wares were in smaller portions compared to Changsha ware and Yue ware, but the Chinese white wares were much more praised in a vast area from East Asia to the Indian Ocean as precious luxury goods. In East Asia, Chinese white wares were purchased by high-ranking monks and nobles; in the Indian Ocean, they were also owned by the courts and the rich. Due to high demand and short supply, imitations of Chinese white wares started to appear in the West Asian region, which became popular and were sold throughout the Indian Ocean. Through the case study of white wares, we can have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exported Chinese ceramics during this period.

责任编辑：李 晴